

孙关宏：不为名利，却关乎政治学人使命

日前，上海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出炉。最高奖项“学术贡献奖”之一，授予了88岁的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以下简称“国务学院”）教授孙关宏。

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的开拓者之一，孙关宏在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教材体系建设上作出突出贡献，在国家理论、民主理论和政治发展研究领域成果卓著。

回首自己的“政治学人生”，孙关宏说自己所做的一切如沧海一粟，微不足道。这一切不为名利，却关乎一代中国政治学人的历史使命。

那时候搞政治学是拼命

复旦十舍毗邻复旦，闹中取静，孙关宏与夫人陈玉华在此居住了40年。家中陈设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但打理得清爽。

书房里，两排书架满满当当，要使劲才能拔出一本，其中可见孙关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参与编写的《政治学概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政治的逻辑》……正是这一本本经典教材，为后来复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谈及新学科的创立和新的学术体系的探索，孙关宏始终强调“集体的力量”：“这是我们政治学教研室集体的功劳。”

这个集体，最初的发动者只有两人：王邦佐，孙关宏。正如许多著作的封面，他们的名字总如连体婴儿般同时出现。

王邦佐曾开玩笑，两人的革命友谊堪比马克思与恩格斯。孙关宏则直言：“我们一起共事，王邦佐是主要决策者。他目光敏锐，有思想和远见，敢于决断。而我见识和能力平

平，但不计名利，勤奋工作，积极配合。”

1978年改革开放后，在解放思想的热潮中，他们感觉有必要深入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寻找了四位志同道合的老师，成立了新的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

1980年，两人积极行动，在上级支持下，成立了政治学专业，并从次年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本科生，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随之改为政治学教研室。

“重建政治学，让政治学科服务于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这是中国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孙关宏说，恢复初期困难重重，有人认为恢复政治学是多余，愿意从事政治学的人也不多，但他们坚持了下来。终于，政治学教研室的人越来越多，事业越来越兴旺。

很快，这个集体迎来了高光时刻——在邓小平关于政治学等学科“赶快补课”的呼吁下，1982年，复旦牵头主办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为22个省市培养了60名学术骨干，点燃政治学在全国恢复、发展的“星星之火”，被称为“新中国政治学的黄埔一期”。

王邦佐晚年曾说：“我们那时候搞政治学是拼命的。”孙关宏很认可这个说法。

政治学应对生存终极关怀

与当年的大多政治学者类似，孙关宏也是半路出家。1955年，他考进复旦中文系，期间学过四门必修政治课，一定程度上算是政治理论的“启蒙”。

1960年，中文系总支书记征求孙关宏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参与马列主义教育系的建



设。“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孙关宏几乎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也是这一年，他与历史系毕业的王邦佐成为同事。

1961年，孙关宏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参加“政治学培训班”，为期一年，打下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基础。结缘政治学纯属阴差阳错，但随着时光流逝，他在教中学，在学中教，发现自己“越研究政治学，越有兴趣，越有感情。”

孙关宏自称天资寻常，思维不算敏捷，真正在思想与学术以至于人生问题上有所开窍，要到90年代中期以后，也就是60岁左右。这个漫长的过程，起始于邓小平“解放思

想”的号召，也离不开他始终在学习领悟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西方政治学著作的精华。

实际上，孙关宏独立的著作只有两本——《中国政治文明的探索》《中国政治学：科学与人文的探索》，都是晚年整理出版的文集。他的学术思想和他对政治学领域的思考和探索，都集中反映在这两本书里。

积极参与集体项目，不代表他没有独立的学术思考。孙关宏言辞之间，时常透露着对历史与现实的关怀。

“作为政治学者，不但要把政治学作为一种职业，而且要把它作为一种事业。”孙关宏十分强调政治学的“人文性”，认

为“政治学更应该有一种对人的生存状况终极关怀的精神。”

他始终关注政治学的一般理论，比如如何看待“中国特色”。前些年，他还发表论文认为，在理论模式上，要处理好中国特色与世界文明的关系。

在孙关宏眼中，学术与做人也是统一的。学术上讲求“科学性、真实性、追求真理”，做人也应当“人格高尚，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

要留住、培养和重用青年

回望一生，孙关宏自认做的最重要的事莫过两件。除了重建了政治学学科、主编或参与主编近10本教材，剩下的便是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

孙关宏多次在公开讲话中回忆重建政治学过往，说的最多的，就是“留住青年人、培养青年人、重用青年人。”

从25岁任教到65岁退休，孙关宏带过近60名硕士生和20多名博士生。他指导学生写论文，态度开放。他从不要求学生做他的课题，也不限制选题方向，“研究生应当独立思考，具有学术创新精神。”

退休后，孙关宏笔耕不辍，写回忆录、学科史。他经常跑学校档案馆查资料，直到今年腿脚再不足以支撑他走到距家仅500米的学校。他的书桌上，如今放着学生林尚立前不久来探望他时送来的新书。

“仁者寿”——孙关宏八十大寿时，有学生特为其题字赠予，他将之放于书架上方收藏。这三个字不仅是后辈的真挚祝福，某种程度上，亦是孙关宏的一生写照。

本报记者 殷梦昊
实习记者 李昂

雷震：最大的心愿是要把优秀人才培养好



“雷老师办公室的黑板上，永远写着一组方程。”提起雷震，话题绕不开轴对称Navier-Stokes方程组。每天，雷震都面对这个著名的难题，十多年来始终在思考。

雷震时常要求学生，学术研究要“充满热情、追求卓越、不畏困难、持之以恒”，这实际上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在雷震课题组里，讨论课是同学们最难忘的时光。上海数学中心一隅白板前，常能看见雷震与同学们结伴讨论的身影，他们时而对视交流，时而笔迹翻飞。

两年前，也正是在这里，在与雷震的探讨中，2018级直博

生刘杰迈出克莱因-高登方程研究的第一步，今年携顶刊成果毕业；同届的任潇、陈可获校“学术之星”特等奖这一研究生学术最高荣誉，全校每年仅6个名额。目前，他们三人已前往国内外各高校博士后入站，继续偏微分方程领域的科研之路。而他们的学长蔡圆副研究员则已回到复旦任教，将知识传递给更多的学生。

如今，上海数学中心这块白板，有一半的时间，由雷震和他的学生们使用。“我们做数学的很简单”，雷震说，“有黑板、有白板，随时随地可以讨论。”满屏演算，承载起源源不断的灵感，从笔下流入学生心间，点

亮一片灵光。

雷震常对学生寄予厚望，鼓励他们树立伟大目标、追求卓越，“去做研究领域内最顶尖的专家，成为时代进展突破的参与者、引领者。”

“数学科研创新，在于抽丝剥茧，凝练出问题的关键模型”，直到像武林高手那样“内功深厚”，自然能够穿梭刀光剑影中，寻得“神功至宝。”雷震说。

雷震最大的心愿，是要把优秀人才培养好，培养三、五名优秀接班人，活跃在中国乃至国际舞台的最前沿，引领偏微分方程研究。

本报记者 汪祯仪